

# 翻譯、文學與跨文化復育

中·英·日的比較文學與翻譯研究

廖詩文◎著  
Shih-Wen Liao



# 翻譯、文學與跨文化復育

---

中·英·日的比較文學與翻譯研究

**Translation, Literature, and Transcultural Remediation**  
Chinese, English, and Japanese Literatures in Comparison and Translation

廖詩文

Shihwen Liao

March 2015

 BOOKMAN BOOKS, LTD.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翻譯、文學與跨文化復育：中、英、日的比較文學與  
翻譯研究 / 廖詩文著. -- 一版. -- 臺北市：  
書林, 2015.03  
面；公分  
ISBN 978-957-445-647-5(平裝)

1.翻譯 2.比較文學 3.跨文化研究

811.7

104003459

翻譯、文學與跨文化復育：中·英·日的比較文學與翻譯研究  
Translation, Literature, and Transcultural Remediation:  
Chinese, English, and Japanese Literatures in Comparison and Translation

First published by Bookman Books, Ltd.  
3F, 60, Roosevelt Rd. Sec. 4, Taipei 100, Taiwan

Copyright © 2015 by Shihwen Liao  
All rights reserved.

著者／廖詩文

編輯／洪雅雯

出版者／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100 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 60 號三樓

Tel: (02) 2368-4938 FAX: (02)2368-8929

發行人／蘇正隆

封面／文潔

郵撥／15743873 ·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一八三一號

出版日期／2015 年 03 月一版

定價／360 元

I S B N / 978-957-445-647-5

# 目次

---

- 1 | 第一章 自序：中・英・日的比較文學與翻譯研究
- 25 | 第二章 合譯鍵鏈中的譯者圖像：重探凡爾納《環遊世界八十天》的中譯
- 61 | 第三章 文學翻譯與文化育生：再思白涅特《小公子》的日譯意圖
- 85 | 第四章 多語複譯與文化復育：以新渡戶稻造《武士道》的中譯為例
- 127 | 第五章 翻譯文學中的國民作家：夏目漱石小說在台灣的譯介與傳播
- 147 | 第六章 翻譯、出版與作家形象：三浦綾子文學在台灣的譯介與傳播
- 175 | 後記
- 177 | 論文出處與說明
- 181 | 參考文獻
- 203 | 附錄
- 203 | 附錄一 台灣出版傳播的夏目漱石作品
- 213 | 附錄二 台灣出版社出版的三浦綾子文學譯本



## 第二章

# 合譯鏈鏈中的譯者圖像

## 重探凡爾納《環遊世界八十天》的中譯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

——老子

一九〇〇年，凡爾納（Jules Gabriel Verne, 1828-1905）的《環遊世界八十天》（*Le tour du monde en quatre-vingt jours*, 1872）（本文以《環遊世界八十天》泛稱凡爾納的原著作品，以《八十日環遊記》表示陳壽彭與薛紹徽合譯的中譯本）以《八十日環遊記》的中文書名譯介出版，這部作品是由福建翻譯家陳壽彭（1855—?）口述、薛紹徽（1866-1911）筆記合譯出版的作品，也是中國翻譯的第一本法國冒險小說。凡爾納的《環遊世界八

十天》在中國的譯介、傳播及其譯本特色的相關研究，伴隨了原本（source text）、譯者，及譯本呈現出的譯者圖像等問題，而在中國女譯家的研究興起之後，薛紹徽是否具有《八十日環遊記》的譯者身分，也會影響到她是否可被視為中國第一位女譯家的地位。這是因為《八十日環遊記》並非由薛紹徽獨力完成，因此有些學者認為陳鴻壁（1884-1966）當被視為中國第一位女譯家（郭延禮 1998a、1998b、2002）。<sup>1</sup>然而，《八十日環遊記》仍是晚清最早由女性文人直接參與譯介的翻譯作品，學者錢南秀（2004）、卓加真（2006）、羅列（2008）等，也皆據此進行薛紹徽的相關研究。

從陳壽彭的譯序可知，《八十日環遊記》在翻譯時所參照的原本，並非取自法文原著（the original），而是選用桃爾（George Makepeace Towle, 1841-1893）翻譯的英文譯本，這也相對帶出中文譯本是否忠實於原著或原本的相關問題。我們該如何看待這部傳播到中國的凡爾納小說？《八十日環遊記》在中國晚清傳播了那些外國知識？此譯本在中國的譯介意義為

---

<sup>1</sup> 陳鴻壁本名陳碧真，廣東新會人。專長為翻譯歐美小說，通英、法文，譯作常發表於《小說林》（1907年1月起出版十二期），翻譯過《電冠》、《第一百十三案》、《蘇格蘭獨立記》等。陳鴻壁在長篇小說的翻譯上，已有不用章回體翻譯的作品，如《第一百十三案》就採分章形式翻譯。小說林出版社曾於1906年出版陳鴻壁獨立翻譯完成的偵探小說，因此學者們認為陳鴻壁才是晚清第一位女譯家。

何？譯作的內容產生了那些異／譯動？晚清的譯者圖像在此譯作中呈現什麼樣的輪廓？為了解上述問題，本文試圖以晚清社會及譯者的翻譯情境為背景，建構合譯鏈鏈中的譯者概念，並據以思考《八十日環遊記》的譯者處境，再透過譯本分析，探討凡爾納的《環遊世界八十天》在中國的傳播現象、譯本的翻譯問題，以及這部譯作折射出的譯者圖像。

## 《環遊世界八十天》的譯介

法國作家凡爾納撰寫的《環遊世界八十天》，描寫的是一位富有的英國紳士與人打賭在八十日內，可以兩萬英鎊完成環遊世界一周的法國冒險小說。故事主角非力士·福格（Phileas Fogg）為了獲勝，與其法國隨從尚萬能（Jean Passepartout）自英國倫敦（London）啟程，隨後前往埃及蘇伊士（Suez），經由印度孟買（Bombay）前往加爾各答（Calcutta），然後沿途經過香港（Hong Kong）、上海（Shanghai），繼而輾轉到了日本橫濱（Yokohama）、美國舊金山（San Francisco），並搭乘火車橫越美國到達紐約（New York），繼而劫船轉往英國利物浦（Liverpool），最後如期地在八十日內（七十九天二十三小時五十七分）橫渡大西洋，順利回返英國。

Phileas Fogg 在《八十日環遊記》中被譯為非利士·福格，姓與名皆採音譯；福格的法國僕人 Jean Passepartout 則被譯為阿榮·巴斯怕透得，姓與名亦採音譯，惟法文的 Jean 音近似中文的「榮」，中譯本於此單音前加上阿字變為阿榮，此種譯法顯示譯者融入了閩南人對人物稱謂的習慣。<sup>2</sup>Passepartout 在這部作品中原本就具有雙關語的意義，而法文原意是指密碼或萬能。由於主角 Phileas Fogg 即將展開環球之旅，新僕名字具有萬事通暢無阻的吉利寓意深得主人歡心，這一點在原作中有所描寫，也是凡爾納結合英法文化及諧音幽默的寫作表現。而在中文譯本中，譯者對於隨從 Jean Passepartout 的譯名採取音譯，並以「榮昌」的「榮」字來表現，同樣表達了吉利之意。

凡爾納以驚人的世界地理知識與對跨國文化的理解，將十九世紀資本主義興起後，英法出現的證券交易所、<sup>3</sup>富人階級的

---

<sup>2</sup> 陳壽彭與薛紹徽皆是福建知名的翻譯家。

<sup>3</sup> 世界上最早的證券交易所，是由荷蘭的東印度公司於 1602 年建立，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證交所，2000 年時，法國的巴黎證交所、荷蘭的阿姆斯特丹證交所，以及比利時的布魯塞爾證交所，三者合併為歐洲證交所 Euronext。1872 年凡爾納於 *Le tour du monde en quatre-vingt jours* 提到的英國倫敦證交所 (London Stock Exchange)，則是成立於 1801 年，然而中國的證券交易所，則是到了 1905 年才由外商組織成立，成立之時，證券市場在中國並不叫做證交所，而是稱為股份公所和眾業公所，前者取自「上海股份公所」，後者取自「上海眾業公所」。至於中國最早的股份制企業，則是成立於 1872 年設的輪船招商局。外商在中國創辦的股份公所與眾業公所雖然很早就有交易，但是 1914 年北洋政府頒布《證券交易法》，推動證券交易所的建立之後，中國才有相關規範，北洋政府也是到了 1917 年方始批准上海證交所開設證券經營業

金錢活動、情治諜報的偵查體系、西方人的浪漫主義色彩等，一一融入於故事情節的鋪陳之中；主角所行之地的風俗民情、世界上重要的都市座標、各地經典的文化特徵都於書中有所描摹，讀者在閱讀故事主角及其僕人的環球旅程時，也能隨之描繪出一個涵攝西方經濟體系、複文化體系，以及環球地理知識的脈動世界。

凡爾納在《環遊世界八十天》中，將主角描述為一位深居簡出、甚為博學，行事低調卻懂得善用大筆金錢處理問題、冷靜且注重榮譽的貴族後裔。故事設定在一八七〇年代的英國社會，並於故事甫始就具體描寫了倫敦上層社會的生活場域、股票市場及股票概念，描繪出近代資本主義世界在英國的發展面貌，使得《環遊世界八十天》成為作者觀察西方金融社會的虛構界域，充滿複合式交通、跨國經濟流動、異文化共存的跨國場景。

這部法文小說圖構出的世界，結合了虛構與真實的故事情節，由科學性的時間與空間知識所織繪。一八七三年桃爾很快就將這部法國小說翻成英文，並於波士頓（Boston）出版了 *Around the World in Eighty Days*，同年倫敦也出版了署名 G. M. Towle 及 N. D'Anvers 的同名譯本。

---

務，至於中國人自設的證交所，則是成立於 1918 年的北京，然而當時中國規模最大的證交所還是位於上海。

除了英文譯本之外，《環遊世界八十天》在亞洲的譯介也非常早，並以日本最先。《環遊世界八十天》的日語譯本，最早是由川島忠之助（Kawashima Tyunosuke, 1853-1938）翻譯。川島忠之助曾表示，明治時期在美國流傳的《環遊世界八十天》英譯本，在美國部分的描寫上超過法文版中的描寫，對美國地理知識有更詳細的增補，對川島忠之助來說，閱讀上的樂趣更高，這也是引起川島忠之助想將此書譯為日文的緣起（柳田泉 330）。然而，川島忠之助在翻譯時參照的原本是法文原著，日語譯本於一八七八年由慶應義塾出版社出版時，書名名目譯為《新說八十日間世界一周》（『新說八十日間世界一周』），這部翻譯作品在日本最早是以「教科書」的方式獲得譯介，並被視為是可幫助明治維新推動強國強種目標的輔助文學（木村毅 204-210）。從這部作品被日本選為「教材」來看，日本教育界與文學界皆十分重視此作品中描寫的世界圖像，關注這部作品對日本可能帶來的影響力，而且還特別重視作品中對西方社會的「出版形態、世界時勢、發達的科技、資本主義的合理性」（橫田順彌 198）等等的描寫。這也意味凡爾納的此部「小說」，在日本不只被視為「虛構」（fiction），也被視為是啟迪民智的啟蒙書。

相較於日本，《環遊世界八十天》在中國的譯介，最早則可追溯到一九〇〇年由經世文社出版的翻譯作品，當時書名譯為《八十日環遊記》。從此譯作書封上的譯者署名「逸儒口述，秀玉筆記」、作者標示為「房朱力士」可知，此書就是凡爾納《環遊世界八十天》的小說翻譯。房朱力士的譯法，是作者儒勒（朱力士）·凡爾納（房）的中式譯名；署名譯者的口述者逸儒，則是翻譯《新譯中國江海險要圖誌》（簡稱《江海圖誌》，1899）的福建翻譯家陳壽彭；<sup>4</sup>筆記者秀玉，則是陳壽彭之妻薛紹徽，據此可知此書是由陳壽彭口述、薛紹徽筆記而成的合譯之作。

這部作品的翻譯，緣起於夫婦閨閣談書筆記而來。當時的翻譯情境，是在薛紹徽對西方現勢感到好奇的情況下，陳壽彭方才撿擇這部作品，作為帶領薛紹徽了解西方世界概廓的啟蒙書（施蟄存 5）。而薛紹徽於聽講時「展紙濡毫」（施蟄存 7），筆記內容，最初顯然僅為個人所用，累積下來，最後卻成為全譯本的初稿。於後，陳壽彭校潤此文，並交由經世文社印刷出版，方使凡爾納的《環遊世界八十天》以《八十日環遊記》的書名在中國傳播。由此翻譯過程及當時的出版情境可

---

<sup>4</sup> 陳延杰，〈近代福建譯壇健將陳壽彭〉，《福州晚報》2005年8月30日。2008年6月19日 <[http://www.66163.com/Fujian\\_w/news/fzen/fzwb/20050830/BIG5/fzb%5E8795%5E%5EWbb01005.htm](http://www.66163.com/Fujian_w/news/fzen/fzwb/20050830/BIG5/fzb%5E8795%5E%5EWbb01005.htm)>。

知，《八十日環遊記》於一九〇〇年的出版背景，與一九一〇年代前後，魯迅（1881-1936）、梁啟超（1873-1929）、周桂笙（1873-1936）等人譯出十餘部凡爾納的作品，主張積極譯介西方科學小說來作為開啟民智的情況是非常不同的。

相較於日本一開始就把《環遊世界八十天》當作教科書，並視其為強國強種的輔助文學，陳壽彭在譯介這部作品時，則是把它視為一般小說，但仍十分肯定作品內容的豐富性，因此選做薛紹徽開啟西方視界的閱讀材料（施蟄存 5）。中日兩國的知識人都注意到《環遊世界八十天》中記述了豐富的世界輿地知識與國際現勢的發展，但兩者對此作品的接受與傳播卻以不同的視角各自展開。

川島忠之助為商人背景，對於《環遊世界八十天》中描繪的世界，保有較多的想像與浪漫情懷；陳壽彭則是曾經留學歐日等地的國費留學生，翻譯《八十日環遊記》時又在翻譯《江海圖誌》（翻譯期間：1894-1899），可見他的心境與川島忠之助有很大的不同，對於世界構圖的看法顯然較川島忠之助嚴肅。再加上中國傳統文人素來重視文以載道的觀念，對於小說等屬「說部」（施蟄存 5）的作品往往視為娛樂，因此即便《八十日環遊記》是以西方最為看重的小說文類撰寫，內容充滿科學新知與世界現勢的描摹，但在當時中國文人的文學觀及社會氣氛

追求富國強兵、開啟民智的背景下，《環遊世界八十天》並未被視為嚴肅的作品。關於這點，薛紹徽在其譯序中也有提及，陳壽彭最先對於此書的翻譯是「鄙而不為」（施蟄存 7）的。

根據陳壽彭在譯序中的說明，可知「桃爾與鄧浮士」（施蟄存 5）翻譯的英譯本是陳壽彭用來為薛紹徽口述內容的原本（施蟄存 5）。關於英文版與法文原著間的差異，除了日本譯者川島忠之助曾表示英譯本在美國方面的資訊上有許多增補（柳田泉 330），巴黎爾與伊凡斯（William Butcher and Arthur B Evans）也曾指出，《環遊世界八十天》的這部英譯本，內容並非完全忠實於法文原著（6-9）。由此可知，陳壽彭當年使用的原本，應為一八七三年由倫敦 Sampson Low, Marston & Co. 出版社出版的作品，或是 1873 由美國波士頓的 JR Osgood 出版社出版的作品。Sampson Low, Marston & Co. 出版社出版的作品，譯者署名 G. M. Towle 及 N. D'Anvers（以下簡寫為 Towle/d'Anvers），最先出版時書名名目譯為 *The Tour of the World in Eighty Days*，後來才又改為 *Around the World in Eighty Days*，但兩書的內容是相同的；而 JR Osgood 出版社出版的譯作，譯者只標上 G. M. Towle 的名字，同時也是《環遊世界八十天》最早的英譯本。如果根據陳壽彭的譯序所述，即可推知陳壽彭當時參照的是 Sampson Low, Marston & Co. 出版社出版

的作品。然而，JR Osgood 與 Sampson Low, Marston & Co. 出版的作品雖然出版地不同，但是內容上也是相同的。

巴契爾與伊凡斯在 *Le tour du monde en quatre-vingt jours* 英譯版的研究中指出，《八十日環遊記》已有超過一百多種的英文譯本，也是凡爾納作品中被出版最多次的小說，但從眾多版本裡面，只能歸納出十一種不同的原始譯本，其餘的譯本則是這些原始譯本的轉譯或盜譯（6-9）。此外，巴契爾與伊凡斯也表示，目前世界上被重刊與出版最多次的英文原創譯本，就是 Towle/d'Anvers 翻譯的版本，但是這個版本的翻譯品質不佳，翻譯質量只達原作的五成，主要問題出在某些文段及文法方面的脫漏（6-9）。

將陳薛合譯的中譯本與桃爾的譯本相較，可以確認陳壽彭的確是以此英譯本做為翻譯的參照本，而且是按原文段落的順序逐步翻譯的。桃爾譯本的第一章第一段內容如下，

Mr. Phileas Fogg lived, in 1872, at No. 7, Saville Row, Burlington Gardens, the house in which Sheridan died in 1814. He was one of the most noticeable members of the Reform Club, though he seemed always to avoid attracting attention; an

enigmatical personage, about whom little was known, except that he was a polished man of the world. (4)

而《八十日環遊記》的中譯如下，

一千八百七十二年（同志壬申），有非利士（名）福格（姓）者，居於擺林塘花園沙非爾路（在倫敦城內），第七號門牌。是屋，乃一千八百十四年（嘉慶甲戌），許兒母利登（福格先代祖父之名）所遺。許兒母利登，為當時新黨名人之一，常自遜抑，以避吸力之大，而時望所歸，有識者咸欽仰之，誠濁世一守禮君子也。（施蟄存 10）

第二章第一段的部分，桃爾的翻譯如下：

“Faith,” muttered Passepartout, somewhat flurried, “I’ve seen people at Madame Tussaud’s as lively as my new master!” Madame Tussaud’s “people,” let it be said, are of wax, and are much visited in London; speech is all that is wanting to make them human. (8)

而《八十日環遊記》的中譯如下：

阿榮沉思良久，曰：「是矣，我這新主人，似曾相識，見於答瑣士太太處。答瑣士太太之客甚眾，皆往來於倫敦，非富即貴，斯亦可尊矣。」（施蟄存 12-13）

由第一章第一段的英中對照可知，中譯的詞序、內容，十分貼近英譯，但是在第二句的部分，英文的 He，指的是 Fogg 而非 Sheridan，中譯本卻誤為 Sheridan 而將整個語意搞錯了；至於第二章第一段的譯文，中譯本未掌握住 Madame Tussaud's 是指蠟像館，因此未將 Passepartout 認為 Fogg 看起來就像面無表情的蠟像一樣的比喻翻譯出來。

陳壽彭口述的內容是英譯本的翻譯，根據巴契爾與伊凡斯的研究已知英譯本的質量原本就不及法文原著，因此陳壽彭與薛紹徽合譯的《八十日環遊記》，與法文原著之間的差異也就更大。陳壽彭與薛紹徽是難以再現凡爾納法文原著的樣貌的，一方面是因為陳壽彭的口述並非完全正確，薛紹徽在筆記時也可能脫漏、改稿，另一方面則是因為英譯本的質量原本就不佳，綜上可知，《八十日環遊記》不僅無法再現（representation）法

文原著的全貌，嚴格來說只能說是桃爾與鄧浮士英譯本的再衍生（successor）。

即便如此，更值得我們關注的是陳壽彭與薛紹徽為何譯介這部作品，而不只限於探討譯本語言現象的理解與表達，因為陳壽彭與薛紹徽合譯的《八十日環遊記》開啟了中國對凡爾納作品的譯介之門，具有明顯的文學史及翻譯史上的意義。因此，陳壽彭與薛紹徽對反映在凡爾納《環遊世界八十天》裡的外國生活和自然環境的闡述就成為必須觀察的焦點，而身為「譯者」的他們是如何審視和闡發作品中不同的民族、文化 and 社會現象，並使原本在中國沒沒無聞的「房朱力士」（即凡爾納）的作品成為讀者的精神食糧，帶動晚清中國的「凡爾納熱」，也就更值得加以探究。

在翻譯的過程中，譯者不僅是原作的讀者，也是譯作的作者，譯者透過自身對原作的理解來對原作進行闡述，不僅扮演了文學傳播中的接收者（receptor），同時也扮演著輸出者的角色，譯者在文學翻譯中擔負的責任既複雜又微妙。在探討凡爾納《環遊世界八十天》的中譯時，除了需要對上述譯作與譯作、譯作與原作進行比較研究外，更值得探討的課題是譯者角色如何對翻譯作品造成影響。《八十日環遊記》是夫妻合譯的作品，口述者與筆記者在這翻譯的過程中是否具有同等的譯者地

位、譯作中反映出的譯者圖像代表誰的面貌、口述者與筆記者對翻譯質量造成哪些影響等等，則是接下來要進行探討的重要課題。

## 孰為譯者？一個合譯鏈鏈下的觀點

晚清譯者的型態，有如嚴復（1854-1921）者，有如林紓（1852-1924）者，也有如傳教士傅蘭雅者（John Fryer, 1839-1928）。如嚴復者，擅長外語，是可自行翻譯詮寫的譯者。如傳教士傅蘭雅者，則是以口述者的身分掛名譯者，與其合作的筆記者幾乎沒有和他相等的譯者地位。如林紓者，靠與他人合作共譯，以「口述—筆記」的合譯方式詮寫譯本，並被視為譯者。值得關注的是，林紓不會外文，需靠他人口述原意，方能再以其文采寫下翻譯。即便如此，林紓仍在晚清被視為大翻譯家，由此可知晚清對「譯者」的認知有多重看法。其中之一就是如林紓一般在翻譯生產過程中的「執筆為文者」。我們已知不擅外文的林紓，曾經透過與他人合作的方式翻譯出百餘種西方小說（陳福康 133），因此被視為與嚴復並列的晚清二大譯家。由此可知，晚清時期曾有將不會外文的筆記者視為譯者的

時期，這與林紓主持過翻譯局並創作等身的特殊背景可能有關。

在晚清對譯者的認定有上述三種的背景下來看薛紹徽，就可視其為林紓類型的譯者，同是擅長聆聽意旨再詮寫為文的寫手。根據陳壽彭在譯序中的說法，薛紹徽不懂外文，在這種情況下，除了援引林紓之例作為薛紹徽譯者身分的論證外，薛紹徽是否可被視為譯者，在某種程度上是頗有爭議的。主要的爭議點是在口述者完成內容的口譯後，筆記者將其聽到的內容進行撰寫或改寫，這一程序（*procedure*）是否也可視為是翻譯的一部分。在合譯鏈鏈關係下的筆記者是否是翻譯過程的參與者、筆記者與口述者間是否具有實質的翻譯鏈鏈關係等等，都會成為筆記者是否具備譯者身份的判別關鍵。

晚清「口述一筆記」模組中的口譯者於翻譯小說內容時，以視譯方式與原文互動，翻譯的工作已在跨語際的翻譯事實上完成，聽寫者即便以古文或其他文體摹寫或潤飾口譯者的口述內容，這時譯文的內容已是口述者與原文互動交流後的產出，是經過口述者對原文的理解及操控後的產物，因此譯文的生產者就是完成語際翻譯（*interlingual translation*）的口述者。如果筆記者是按口述者表達的內容逐字或逐句記下，則此文稿即為現代所稱的逐字稿，記錄者僅可視為書記者，顯然是位於翻譯

場域外的旁觀者，是整個翻譯機制外的他者。然而，假使筆記者並非逐字或逐句記下口述者的講述，而是以「換句話說」（rewording）的方式，以相同語言把對等意義上的內容重新表達，則就一如雅各布遜（R. Jakobson, 1896-1982）在翻譯類型的分類中，將此一過程稱為語內翻譯（intralingual translation）一般，筆記者也是翻譯的生產者，因此也應被納入整個翻譯寫作方案的機制之內，成為合譯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在合譯鍵鏈上成為翻譯的參與者。

我們若從雅各布遜對翻譯類型的定義來看《八十日環遊記》的生產，可知將原作譯為中文而在兩個語言之間進行語際翻譯的實為陳壽彭，而薛紹徽是根據陳壽彭的中譯口述再進行文字記述或改寫者，因此嚴格說來，薛紹徽在這整個翻譯生產過程中，若不是僅止於扮演記錄員，則可說是負責了語內翻譯的相關工作。亦即陳壽彭與薛紹徽之於《八十日環遊記》的生產，是在不同階段參與了不同的翻譯作動，陳壽彭與薛紹徽是在合譯鍵鏈中共同完成此一譯作（產物）的。

從這個角度來看，合譯模組中的口述者與筆記者，在整個翻譯方案上都是生產者。口述與筆記的翻譯分工在整個翻譯過程中，其實是不可斷裂區隔的密接環節，彼此之間是不能單獨存在而使翻譯方案得到完成的。在此鍵鏈關係中，口述、筆

記、修潤等翻譯分工，對於翻譯產物（譯文）的完成都有影響力，譯文既非口述內容的逐字複述，亦非筆記者對原作的擬作或模仿，而是在口述－筆記－修潤間進行多次「解疆域」（*deterritorialisation*）和「再疆域」（*reterritorialisation*）的鏈接後，<sup>5</sup>最後以多工詮釋且別於原文語言的樣態展現出來的翻譯產物。

在《八十日環遊記》的翻譯方案（*translation project*）中，以口述方式搬運原文載體＝故事內容的陳壽彭，是翻譯鏈鏈中的一項環節，薛紹徽以「換句話說」的方式嘗試生產載體，也是在進行一種翻譯性的轉換。在《八十日環遊記》的譯本生成過程中，陳壽彭以視譯（眼看口說）解釋（*interpreting/explaining*）*Around the World in Eighty Days*，發生的是雅克布遜所說的語際翻譯，進行著與原文互動交流的翻譯關係，在此翻譯方案的框架（*frame*）內，如果視點移到筆記者身上，則可發現口述者是在連續翻譯的鏈鏈接合下，再次進行解疆域與再疆域的翻譯操作，發生的是雅克布遜所說的語內翻譯。在這密接的翻譯鏈鏈中，口述者與筆記者不斷產生連動性，在勘合鏈鏈的和諧狀態下完成了翻譯的實踐

---

<sup>5</sup> 解疆域與再疆域的概念來自德勒茲與瓜達里。參閱 Gilles Deleuze & Fe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trans. Brian Massum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0).

(translating)。如果譯者指的是將原文進行翻譯工作的人，那麼陳壽彭與薛紹徽在《八十日環遊記》的翻譯生產中，顯然是在不同時間以不同連接方式（說讀與聽寫）不斷進行小說內容的解疆域化和再疆域化的兩個人，他們合力構建出的嶄新配置（agencement），就是最後完成的《八十日環遊記》這一複合多元體（multiplicities）。

### 譯者的視線及其翻譯

既然陳壽彭與薛紹徽是在合譯鍵鏈之下共同完成《八十日環遊記》的翻譯，那麼譯文中哪些部分來自陳壽彭的表述，哪些部分屬於薛紹徽的重寫，僅以譯本檢視是難以了解的。但是，藉由譯者序、譯者背景、譯本的書寫特徵等等的分析，仍有助我們探究《八十日環遊記》反射出的多元譯者圖像。

從翻譯的過程來看譯作的生產，譯者在以其他語言表達原作內容時，一方面要理解原文，發揮出譯者的認知功能；另一方面又在影響原文，發揮譯者的操控功能，而這兩種功能在翻譯的過程中，是以反向的力量把譯者與原文連接起來的，因此譯本的形成，與譯者看待原文的視線就有極為密切的關係，而且在雙向的互動交流中，翻譯參與者的行為與譯文的風格走向

皆會受到影響。譯文可能反映出原文的本質，但有時也會反映出譯者對譯文的預期。我們若把譯者在原文上發揮認知功能及操作功能時必會出現的反身作用作為觀察的目標，據以檢視《八十日環遊記》中譯者對原作的改動，將有助我們了解此部小說在哪些地方特別吸引譯者的目光，也能描繪出譯者的意識形態、專業特長、翻譯策略及文學風格。

細考譯本目錄，可見三分之一是按照英譯本標題翻譯的，另外的三分之二則有從後設角度處理的跡象。關於三分之二的標題「改寫」，整體之間存有連貫原則，這三分之二的標題乍見之下並未忠實於原文，但彼此卻是以後設歸納的方式重新寫過。仔細比對這些看似不忠的章節回目，大多是在「經貿用語」，如 A New Stock、Option Market；「地理用語」，如 Red Sea、Hong Kong；「工業用語」，如 Pacific Railroad Express、Railroads of the Union 等專有名詞（proper terms）上。這些詞彙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看似一般常識，但卻是晚清文人感到陌生的西方文物與制度。舉例來說，根據黃克武的研究，bank 一詞在嚴復的翻譯中曾被譯為銀行或板克（1-42），而陳壽彭在翻譯此語時，則是譯為「銀號」（施蟄存 10），顯然當時晚清時期的知識人在翻譯外國事務時，還在各自表述的階段，尚無

特定說法等專有名詞的統整，因此關於這些來自西方的專有詞彙，在譯法上除有採取意譯的情況，也有以音譯處理的例子。

此外，《八十日環遊記》的中文目錄，是由駢體文寫成，每一章節，全以相同字數翻譯，對仗工整。由於中國白話刊物的發行發軔於二十世紀之後，使用文言文翻譯在晚清只是一種普遍性的共同語境，再加上薛紹徽在晚清文人中屬於固守舊傳統的支持者，因此她在筆記之時是否特別刻意以駢文體來加以詮寫，在譯者意圖上雖難考證，但從譯序及目錄的翻譯形式來看，都有透露出譯者試圖以中國傳統的書寫模式重新闡釋外國奇風異俗的翻譯意圖。譯者對小說作品的表現形式、章節表現，採取了明顯的目的原則（符合駢體文的規定）優先於忠實原則（忠實於標題意義）的作法，而在章回條目的詮釋上，有很多的重寫與編輯痕跡，這在今日中文編譯流程中是十分常見的，譯文與原作間的差異並非出於譯者誤譯或亂譯，而是一種編輯上的刻意，是譯者故意改成章回體的方式編寫的結果。換言之，為了符合章回體形式上的規範，《八十日環遊記》在章節回目上所做的譯／異動，與當代編譯作品時會刻意改寫、整編的意圖極為相似。

誠如前述，當時的翻譯情境，是陳壽彭白天翻譯《江海圖誌》，晚上才於閨閣中給薛紹徽講述《八十日環遊記》的，而

《江海圖誌》與《八十日環遊記》這兩書之間的共通點，則是在內容上皆涉及了世界輿地知識，《八十日環遊記》還有更多港灣、島嶼與沿海氣候、風向、潮汐變化等等的資訊，以及更細膩的地理名稱、輪船、火車、各種歐式丈量單位。這些內容，對水師出身的陳壽彭而言，是可如數家珍、侃侃而談的西方文物。具有專業知識的陳壽彭，無疑是當時最合適翻譯《八十日環遊記》的人選。

陳壽彭在科技翻譯上的長才，也反映於《八十日環遊記》的譯本上。《八十日環遊記》中的地理名詞，幾乎都由譯者加上括弧小註進行延伸說明。這些加註增補的內容，在桃爾的英譯本中是沒有的。除了地理名詞之外，舉凡單位數據、船車工具等部分，陳壽彭也都亦步亦趨地加以翻譯，這可與桃爾的英譯本兩相比對後得到確認。這意味陳壽彭是以治學的方式進行註釋的。譯本中的「括弧小字」具有註解輿地資訊的功能。舉例來說，中譯本的第二十九回處有一段寫道：「時已過西經線子午線百零五度（北百勒時鎮，在百零一度處。今做百零五度誤）」（施蟄存 115），若拿桃爾的英譯本兩相比對，英譯本的確是寫一〇一度（185），<sup>6</sup>可見陳壽彭註解《八十日環遊記》中的地理

---

<sup>6</sup> Towle 的英譯原文內容如次：“The one hundred and first meridian was passed.”參閱 Towle 185.

資訊時，不只是在進行翻譯，還是以治學及校定者的態度來對小說中提及的地名進行相關的檢討。

然而，若非輿地方面的資訊，陳壽彭在潤稿時，就沒有特別著眼。舉例來說，第三十一回中有段譯文寫道：「阿馬夏與赤加哥相接，則由於赤加哥與石島（一埠名，在亦林奴士之西北）所通之軌道也。向東而去，所經者凡五站。」（施鰲存 126），對照桃爾的英譯文，內容如次：“Omaha is connected with Chicago by the Chicago and Rock Island Railroad, which runs directly east, and passes fifty stations.”（206），文意應為「五十站」，而非「五站」，然而陳壽彭在同一句話中，並未發現數詞的問題，但卻注意到「石島」一詞且加上註解，這表示陳壽彭真正關心的，是有無為晚清讀者傳達出正確的世界地理知識，凡爾納小說的文學價值或其他功能則是較為其次的問題。

《八十日環遊記》中的譯註並非凡事皆註，加註的地方大多屬於外國景物、事物的名詞註解，像是「語言用語」、「地理用語」或「工程用語」。在這些詞語後方，陳壽彭會加上精確的位置描述、音譯詞的外文原意、標高全長等數據。比如，在第六回中，「新世界」（the New World）（施鰲存 26）這個詞彙，陳壽彭就在詞語後加上「（南北墨洲之稱）」（施鰲存 26）的括號

註，強調此處意指南北美洲、<sup>7</sup>在「《太晤士新報》」（施鰲存 15）、「《士登打得新報》」（施鰲存 15）以及「《地利電報》」（施鰲存 15）這些詞條之後，<sup>8</sup>也加上「（太晤士），譯言時也。士登打得，譯言旗也）」（施鰲存 15）的註解，意指「太晤士這個音譯，其英文原意為時間。士登打得這個音譯，其英文原意為旗幟」。另外也有在「（此電以倫敦為總歸，所謂路透電音者是也）」（施鰲存 15），以及在地名「程低尼古」（施鰲存 36）後面加註「（在派第凡之東南，距恰老加打之北 17 迷當）」（施鰲存 36）等等的例子。<sup>9</sup>

陳壽彭也會針對一部分的文化詞彙予以加註。比如在第十回處，陳壽彭將「婆羅門」（Brahmin）音譯為「蒲拉銘」，<sup>10</sup>在

<sup>7</sup> 此處 Towle 的英譯本內容如次：“If he had indeed left London intending to reach the New World, he would naturally take the route *via* India, which was less watched and more difficult to watch than that of the Atlantic.”參閱 Towle 31.

<sup>8</sup> 此處 Towle 的英譯本內容如次：“A flunkey handed him an uncut *Times*, which he proceeded to cut with a skill which betrayed familiarity with this delicate operation. The perusal of this paper absorbed Phileas Fogg until a quarter before four, whilst the *Standard*, his next task, occupied him till the dinner hour.”以及“The *Daily Telegraph* says that he is a gentleman.”參閱 Towle 13-14.

<sup>9</sup> 此處 Towle 的英譯本內容如次：“...turns thence eastwardly, meeting the Ganges at Benares, then departs from the river a little, and, descending south-eastward by Burdivan and the French town of Chandernagor, has its terminus at Calcutta.”參閱 Towle 47.註解中的「迷當」，是英文 miles 的意思，也就是哩，為陳壽彭用來翻譯距離的單位詞。

<sup>10</sup> 此處 Towle 的英譯本內容如次：“Passepartout, however, thinking no harm, went in like a simple tourist, and was soon lost in admiration of the splendid Brahmin ornamentation which everywhere met his eyes, when of a sudden he found himself sprawling on the sacred flagging.”參閱 Towle 51.

這詞條後面立刻以括弧小字加註如下：「(乃三頭四臂之佛首，戴九葉冠，一首執鈴，一首執杵，一首執經，一首執念珠，乃印度開天闢地之始祖，是為其第一代聖賢)」(施蟄存 37)。雖然陳壽彭曾赴日本半年，但在《八十日環遊記》中關於日本文化風俗的相關譯詞，就未如佛學相關的詞彙一樣進行解釋，可見陳壽彭在譯註撰寫上，主要是以自身熟悉的文化詞語為主。以第二十三回中的譯文為例，這部分在描寫日本的「天狗」時，譯為「恩主丁瞿菩薩」(施蟄存 90)，<sup>11</sup>這裡的「恩主丁瞿菩薩」指的是日本民俗傳說中具有法力的長鼻怪天狗神，「恩主」、「菩薩」都是福建地方對神祇的敬稱，陳壽彭將天狗神 (god Tingou) 中的 Tingou 音譯為「丁瞿」，將 god 翻譯成「菩薩」，兩相結合譯成「恩主丁瞿菩薩」，這種歸化翻譯的技巧，能夠幫助讀者以中國中心主義的觀點，透過中國化的折射，進行外國相關事物的聯想，但在文化情境上，妖怪與菩薩之間的差異就可能產生明顯的文化誤讀。其他像是在翻譯日本「弁天」(Benten) 時，<sup>12</sup>音譯為「拜忝」，並於詞後加註「(似即天

---

<sup>11</sup> 此處 Towle 的英譯本內容如次：“Passepartout, though he had not been able to study or rehearse a part, was designated to lend the aid of his sturdy shoulders in the great exhibition of the “human pyramid,” executed by the Long Noses of the god Tingou.”參閱 Towle 144.

<sup>12</sup> 此處 Towle 的英譯本內容如次：“The Japanese quarter of Yokohama is called Benten, after the goddess of the sea, who is worshipped on the islands round about.”參閱 Towle 136.

后)」，也是利用相同的翻譯詮釋法，透過閩南佛道文化與天上聖母的信仰概念來進行翻譯，以圖達到輔助讀者理解日本文化的溝通效果。

《八十日環遊記》大多數的誤譯是出現在金融詞彙的表達方面。比如在第三回中，有段內容如下：

雖然福格此賭，未必果贏二萬金磅，僅有一半吉利，因此行易中有難，煞費周折，雖有成竹，究不能左券預操。無如已出大言，勢成騎虎，故不計成敗利鈍，毅然行之。  
(施蜚存 19)

此處的譯文是將英國貨幣「英鎊」全譯為「金磅」，但全文統一，並無不妥。然而「僅有一半吉利」，則是譯自「half of his fortune」，英文原意應指「他的一半財產」，此處把 fortune 譯為「吉利」，是把 fortune 當成「命運或運氣」，而非財產。由於把 fortune 解讀為「吉利」，因此造成後面的翻譯與原文內容偏離。

事實上，對照英文原文，這一部分的內容如下，

He certainly did not bet to win, and had only staked the twenty thousand pounds, half of his fortune, because he foresaw that he might have to expend the other half to carry out this difficult, not to say unattainable, project. (Towle 19)

意指，

他拿出兩萬英鎊（他的一半財產）做賭注，當然不是為賭而賭，而因為早已預見自己必須花掉另外一半的金錢來完成這項雖非不可能，卻也是艱難萬分的計畫。（本文為筆者所譯）

《八十日環遊記》中對於外國幣值、金融用語、商業交易等詞彙的翻譯，並沒有如地理用語或機械用語那般費工詳註，再加上前面提到過章回標題都有刻意迴避金融用語的情況看來，可見譯者對作品中描寫到的西方金融制度、博弈制度等概念是較為陌生或不感興趣的。在《八十日環遊記》中，有一段提到「賭局賠率」，譯文如下寫道：

或照全批，或做分條，視此事頓形重大，蓋自輿地會所出駁斥福格之說。五日後，始初責儘五金鎊，繼而十金鎊，嗣後責二十金鎊，五十金鎊，迄於百金鎊，而賭者益毫，咸以福格之歸，能否如期，以為勝負之準。(施鰲存 23)

對照桃爾譯本，此處的英文如下，

Bonds were issued, and made their appearance on 'Change; "Phileas Fogg bonds" were offered at par or at a premium, and a great business was done in them. But five days after the article in the bulletin of 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appeared, the demand began to subside: "Phileas Fogg" declined. They were offered by packages, at first of five, then often, until at last nobody would take less than twenty, fifty, a hundred! (6-27)

《八十日環遊記中》還有一些單位用語的錯譯像是 stock 股票、證券，被譯為「彩票」(施鰲存 23)、Stock Exchange 交易所，未被譯出、the City 商行，譯為「城中司帳」(施鰲存 10)、the Bank 銀行，譯為「銀號」(施鰲存 10)、the cards 撲克牌，譯為「葉子」(施鰲存 18) 等等都是類似的問題。這類翻

譯訛誤的產生，必須考量到當時相關的西方風俗、金融制度尚未傳入中國的背景。

至於一些外國器物，《八十日環遊記》中則多採用解釋的方式處理，亦即僅就定義、外型或外觀予以描述，譯者並未在自造新語上有較多著墨。例如，gentleman 紳士，被譯為「文雅名望之人」、engineer 工程師，被譯為「管理汽機者」（施蟄存 15）、sledge 雪橇、land-yacht 路上快艇，被譯為「溜車有帆者」（施蟄存 123）、tobacco 菸草，被譯為「淡芭菰之絲」（施蟄存 86）、Formosa 美麗島，被譯為「台灣島」（施蟄存 80）、Tropic of Cancer 北回歸線（施蟄存 80）則未譯出等。

由於晚清對於當代「文化」、「文明」這些詞語的概念，是在梁啟超之後才逐漸產生，因此當時普遍存在於晚清人民心中的「世界」觀，仍是自古以來把中國當作「世界」中心的「中國中心主義」（Sino-centrism）。對曾遊歷異邦的留學生如嚴復、陳壽彭等晚清文人而言，許多《八十日環遊記》中提到的西方事物，在當時是前所未聞的。為了翻譯這些異邦的奇風異俗及外國文物，晚清譯者在翻譯方法的選擇上，大致不脫以解釋或音譯的方式對應。陳壽彭在翻譯《八十日環遊記》中的異邦文物時，翻譯策略上明顯使用較多說明與解釋的技法。全文

金融詞彙上的缺失，則可能是因譯者不大了解西方經濟體制及相關詞語的意義所致。

凡爾納原作中的福格一角，集結了冷靜、投機、財富、知識、膽量等特質於一身，可說是凡爾納心中時代成功者的象徵，而譯者對於福格一角也有明顯的偏好。在《八十日環遊記》第五回中，凡爾納想要描寫十九世紀英國人熱中地理並喜愛在報章上談人八卦等現象，同時也想表達他對英國人喜好打賭的習性之觀察，於是作品中有一段情節描寫如下：

大家都認為福格是個怪人，跟他打賭的那些會員，也受到責難，人們認為提出這種賭注的人簡直是個瘋子。許多以這話題發表文章的報紙都寫得很精彩。英國人一向對於地理方面的議題很感興趣，因此不論是那個階層的讀者，都很喜歡閱讀關於福格旅行的文章。最初幾天，有些大膽的人都支持福格，大部分是婦女，尤其是在《倫敦新聞畫報》刊出俱樂部提供的福格照片後。《每日電報》的一些讀者甚至說：「為什麼不行？比這更奇怪的事還多着呢！」但是沒多久，這家報紙的論調也消沈下去了。<sup>13</sup>

（本文為筆者所譯）

---

<sup>13</sup> Towle 的英譯本對應內容如次：‘People in general thought him a lunatic, and blamed his Reform Club friends for having accepted a wager which betrayed the

然而，《八十日環遊記》的中譯本並未仔細譯介凡爾納對英國人的描寫，反而關注福格的人格特徵，重寫了福格的形象。《八十日環遊記》的譯文如下：

時人既疑其病狂，兼責維新會友，有意設局誑賭，眾口鑠金，莫衷一是。要之福格奮往直前之慨，實為英國輿地學問，別開生面，別添閱歷。冒昧未必不可以成事，特視其心能誠，其志能苦與否耳。彼紛紛之議其後者，不過馳騁筆墨，供其談助，于福格實無所增損也。（施蟄存 22）

這段翻譯一則未將原文描寫大眾之中的女性反應與男性反應譯出，二則未將西方小說中常見的對話形式譯出，反而加上了譯者對於故事角色的個人喜惡。這一現象也出現在第六回中。譯者對於福格對手非克士（Fix）的詮寫，也如對福格的翻譯一樣

---

mental aberration of its proposer. Articles no less passionate than logical appeared on the question, for geography is one of the pet subjects of the English; and the columns devoted to Phileas Fogg's venture were eagerly devoted to Phileas Fogg's venture were eagerly devoured by all classes of readers. At first some rash individuals, principally of the gentler sex, espoused his cause, which became still more popular when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came out with his portrait, copied from a photograph in the Reform Club. A few readers of the *Daily Telegraph* even dared to say, "Why not, after all? Stranger things have come to pass." 以上參見 Towle 25.

加上了個人的喜惡，使得中文版中的非克士成為集官氣、懷疑、奸詐、急躁等特質於一身的惡徒，中譯文如下：

貌非良善，臉聰明而心陰鷙，目光閃爍於濃眉之下，流視不止，蓋其心有所專注，深恐當面錯過。上下眺矚，若不能稍容須臾者。此人為誰？即非克士，是近奉英國委派，密探銀號劫賊之一人也。（施蟄存 24）。

事實上，凡爾納擅長運用非形上學的描寫手法及心理學概念來建構作品。在原作中，凡爾納並未將非克士描寫成一位「貌非良善」、「臉聰明而心陰鷙」（施蟄存 24）的角色，這些帶有抽象概念及人格評價意味的詞語是譯者創造出來的，實際上英譯本的內容如下，

看起來相當精明，帶點神經質，眉頭緊緊地皺著。他那長長的睫毛下閃動著犀利的目光，但他卻不斷地眨眼刻意掩飾。此時，他不停地走來走去，看來顯得很不耐煩。這人名叫非克士，英國國家銀行竊案發生後，他就是被派到各港口的英國警探之一。（本文為筆者所譯）<sup>14</sup>

---

<sup>14</sup> Towle 的英譯本對應內容如次：“The other was a small, slight built personage, with a nervous, intelligent face, and bright eyes peering out from under

與原文差異較大的部分主要是在人物的描寫上，這意味譯者在譯文中投入了自身對角色的喜好與判斷，《八十日環遊記》在譯介風格與文體表現上，也因而來回於中國章回小說及英美遊記間，成為具有濃郁中國人物書寫風格的西方小說譯本。

## 結語

陳壽彭與薛紹徽合譯的《八十日環遊記》，參照的原本並非來自凡爾納的法文原著，而是取自桃爾的英譯本，因此《環遊世界八十天》的中譯本《八十日環遊記》與凡爾納法文原著間具有差異已是可想而知，而與英譯本的差異則主要體現於人物角色的描述、金融詞彙的轉譯、對話文體轉為描述文體等方面，與其說《八十日環遊記》是凡爾納作品的全譯本，毋寧說是英文版的「詮譯本」。

藉由檢視《八十日環遊記》中的譯文，我們可以得出幾個結論：譯者對於小說人物的喜惡之感，會反映在譯文的詮寫之上；譯本中大量注解的詞條，大多集中在地理資訊及異國文化

---

eyebrows which he was incessantly twitching. He was just now manifesting unmistakable signs of impatience, nervously pacing up and down, and unable to stand still for a moment. This was Fix, one of the detectives who had been dispatched from England in search of the bank robber;”以上參見 Towle 28-29.

方面的語彙，至於全文在金融詞彙方面的翻譯缺失，則顯示西方證交所等金融體制的相關知識尚未普及於晚清社會，以致陳壽彭與薛紹徽在翻譯相關用語時，找不到對等詞語來表達，進而形成誤譯、漏譯或不譯的現象。與西方相較，中國文人自古就不重視小說作品，僅把文以載道的經史子集視為嚴肅文學，在東西方文人對作品文類及其價值的看法大異其趣的背景下，《八十日環遊記》的中譯遂無緣成為晚清富國強兵政策推行下的補充文學。但是陳壽彭與薛紹徽夫妻在合譯鍵鏈的密切合作下共譯此書，卻也為晚清西書翻譯史及翻譯文學史留下了一段夫唱婦隨的佳話。

## 引用書目

- Benjamin, Walter.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Ed. Lawrence Venuti.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75-82.
- Butcher, William & Arthur B Evans. "The Most Translated Verne Novel: (A Tour of) (A)round the World in Eighty Days." *Nautilus 2* (2002): 6-9.
- Deleuze, Gilles & Fe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Trans. Brian Massum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0.
- Jakobson, Roman. "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Ed. Lawrence Venuti.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138-143.
- Qian, Nanxiu. "Borrowing Foreign Mirrors and Candles to Illuminate Chinese Civilization: Xue Shaohui's Moral Vision." *The Biographies of Foreign Women, NAN NU* 6.1 (2004): 60-101.
- Towle, George Makepeace. Trans. *Around the World in Eighty Days*. 1873 By Jules Verne. Boston: James Osgood, reprinted by New York: Books of Wonder, Morrow, 1988.

木村毅。〈叩けばひびく小説・「八十日間世界一周」の翻訳——明治大正文学夜話4〉。《国文学：解釈と鑑賞》30.4 (1965): 204-210。

卓加真。〈晚清的首部完整翻譯旅遊文學——薛紹徽譯《八十日環遊記》之策略與影響〉。書寫中國翻譯史：第二屆中國譯學新芽研討會。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翻譯研究中心，2006年。無頁碼。

柳田泉。《明治文学研究第5卷：明治初期翻訳文学の研究》。東京：春秋社，1961。

施蟄存編。《中國近代文學大系（1840-1819）翻譯文學集2》。上海：上海書店，1990。

黃克武。〈清末嚴復譯語與和製漢語的競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62 (2008): 1-42。

郭延禮。《中國近代翻譯文學概論》。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

郭延禮。〈陳鴻璧，一位被遺忘的近代女翻譯家〉。《中華讀書報》1998年6月17日：第10版。

郭延禮。〈二十世紀第一個二十年近代女性翻譯家群體的脫穎〉。《中華讀書報》2002年5月8日：第23版。

陳延杰。〈近代福建譯壇健將陳壽彭〉。《福州晚報》。網路文章。2005年8月30日。2008年6月19日 <[http://www.6163.com/Fujian\\_w/news/fzen/fzwb/20050830/BIG5/fzwb%5E8795%5E%5EWbb01005.htm](http://www.6163.com/Fujian_w/news/fzen/fzwb/20050830/BIG5/fzwb%5E8795%5E%5EWbb01005.htm)>。

陳福康。《中國譯學理論史稿》。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6。

薛紹徽。《薛紹徽集》。北京：方志出版社，2003。

羅列。〈女翻譯家薛紹徽與《八十日環遊記》中女性形象的重構〉。《外國語言文學》98 (2008): 262-270。

橫田順彌。〈近代日本奇想小説史——または、失われたナンジャモンジャをもとめて(5) なぜ『八十日間世界一周』だったのか?〉。《SF マガジン》43.5 (2002): 193-201。

## 論文出處與說明

- 第一章** 自序：中·英·日的比較文學與翻譯研究：新刊。
- 第二章** 合譯鍵鏈中的譯者圖像：重探凡爾納《環遊世界八十天》的中譯：改題、加筆、改稿自〈譯之獨秀的隱身美人：以薛紹徽的譯者姿勢及其譯作為例〉口頭宣讀於第三屆中國譯學新芽研討會：書寫中國翻譯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8年12月。
- 第三章** 文學翻譯與文化育生：再思白涅特《小公子》的日譯意圖：改題、加筆、改稿自〈文化育生之場：白涅特《小公子》的日譯研究〉，原刊載於《翻譯學研究集刊》第十八輯。2014年12月，頁41-50。部分內容曾以〈翻譯時代的女性譯／異勢力：以若松賤子及其譯作《小公子》為例〉之題口頭宣讀於「生命、政治、倫理：文學研究的回應」第32屆全國比較文學會議，台南市：成功大學。2008年5月；研究概念曾以〈從「家」到「Home」：天主教聖家文化與《小公子》日譯版的改譯〉之題口頭發表於輔仁大學天主教學術研究院第一屆天主教文學微型論壇「天主教文學之敘事、主題與變異」，新北市：輔仁大學。2010年12月。

- 第四章 多語複譯與文化復育：以新渡戶稻造《武士道》的中譯為：改題、加筆、改稿自〈文化多元性的翻譯與跨文化的復育：以多語源的《武士道》譯本為例〉**，原刊載於《廣譯：語言、文學、與文化翻譯》第九期。2013年9月，頁93-123。部分內容曾以〈移／譯地之旅：《武士道》譯程上的轉生與傳承〉之題口頭宣讀於「第四屆翻譯與跨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越界與轉化」，台北市：政治大學。2012年11月。研究概念曾以〈武士道三譯本中的文學劇碼與文化描述〉口頭發表於第二屆輔仁大學比較文學微型論壇，新北市：輔仁大學。2011年6月。
- 第五章 翻譯文學中的國民作家：夏目漱石小說在台灣的譯介與傳播**：改題、加筆、改稿自〈夏目漱石小說的譯介在台灣〉，原刊載於《編譯論叢》第八卷第一期。2015年3月。頁83-102。
- 第六章 翻譯、出版與作家形象：三浦綾子文學在台灣的譯介與傳播**：改題、加筆、改稿自〈三浦綾子文學的譯介在台灣〉，原刊載於《編譯論叢》第七卷第一期。2014年3月。頁185-212。研究概念曾以〈三浦綾子的文

學譯介在台灣〉之題口頭發表於第三屆輔仁大學比較文學微型論壇，新北市：輔仁大學。2012年3月。

後 記 新刊。

附錄一 原刊於〈夏目漱石小說的譯介在台灣〉。《編譯論叢》8.1 (2015): 83-102 中的附錄。

附錄二 原刊於〈三浦綾子文學的譯介在台灣〉。《編譯論叢》7.1 (2014): 185-212 中的附錄。

